

论芒福德城市功能思想的教育意蕴及其启示

李云星

摘要: 芒福德认为城市具有磁体、容器和文化功能。他从教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城市的本质和使命,认为城市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让人成其为人。在教育意义上,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意味着城市让人受更多的教育,让人性更完善。当前中国城市化建设需要实现寻求“教育转向”,并发掘城市建设中的“教育资源”。

关键词: 芒福德;城市功能;教育转向;教育尺度

中图分类号: G51-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13)05-0128-06

“城镇化”、“城市化”已成为当前中国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之一。据报道,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等 10 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即将出台。新一轮的“城镇化”发展方案将在未来十年拉动 40 万亿投资。^[1]在通往城市化的道路上,有许多前提性、基础性的问题值得思考。城市是什么?它对人意味着什么?它的本质和功能究竟有哪些?这些问题的审慎思考不仅

有助于我们看清城市化已走过的路,更有助于明确城市化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思路。

上述问题的思考,有必要参考借鉴西方城市思想家的理论遗产。在众多西方城市思想家中,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无疑是最为深刻、最为璀璨的一位。^[2]本文试图阐释芒福德城市功能理论,解读芒福德城市功能思想的教育蕴涵,并论述其对当前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启示。

收稿日期:2013-05-25

作者简介:李云星,男,湖北嘉鱼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浙江 金华 32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十二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重大项目“基础教育改革中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中国特色研究”(课题编号:11JJD880016)、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演变与发展趋势研究”(课题编号:BAA110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芒福德眼中的城市三大功能

(一) 城市的磁体功能

芒福德所言的“磁体功能”即城市吸引人群、组织和各种资源的功效能力。芒福德认为城市的磁体功能继承于乡村的祭祀死人等活动。与一般认为城市起源于市场的观点不同,芒福德认为城市起源于乡村。“农业村落,而不是市场,是城市的原型,它的保护、储藏和保持活力的方式是城市的本质核心。”[3](p. 325) 乡村对死人或先人的祭奠活动促使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些活动有着比一般活动更为丰富的内涵。“岩洞圣地礼仪活动不同于简单的日常聚会、食宿贸易活动,而是促使人类形成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不仅食物有所增加,尤其表现为人们广泛参加的各种形象化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社会享受有所增加;它表达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4](p. 8)

祭奠等活动作为磁体功能的最初雏形在乡村向城市过渡的过程中得到继承与更新。起初,城市对乡村“磁体”功能的承接主要依托的是宗教。“在古代城市中,这一作用是由宗教组织来完成的,因为宗教构成了生活中较纯良的那一部分。”[4](p. 88) 随着神权与王权的过渡和结合,国王逐渐开始拥有“磁体”功能。“在城市的集中聚合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之下。”[4](p. 38) 随着神权和王权进一步向世俗权力过渡,“教皇”与“国王”的“磁力”逐渐式微。不过,城市磁体功能的本质形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追求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并未改变,改变的不过是形式。磁体功能的精神之维开始慢慢退却,物质维度日益彰显。今天,更多的人进入城市不是为了寻求神灵的庇佑或表达对神灵的虔诚信仰,而是为了追寻更充足的物质享受和时尚的生活方式。纽约、东京、巴黎、伦敦、上海等城市成为人们向往的目的地,因为这些城市拥有华美的服装、精致的美食以及赏心悦目的现代建筑。人们相信,只要置于其中就有可能追寻一种美好生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理念依然吸引着更多的人投入城市、融入城市,追寻自己的

“城市之梦”。

(二) 城市的容器功能

相比于磁体功能,城市的容器功能发育得稍晚一点。因为城市在容纳人、组织、制度及其它事物之前必须首先吸纳人群和各种组织,否则城市便无可容之物。尽管城市的容器功能晚于磁体功能,但芒福德认为城市的容器功能更为重要。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因为城市主要地还是一种储藏库,一个保管者和积攒着。城市是首先掌握了这些功能以后才能完成其最高功能的,即作为一个传播者和流传者的功能。[4](p. 104) 尤其是在象征性符号发明之后,城市作为容器的容纳能力大大地增强“它不仅较其他任何形式的社区都更多地聚集了人口和机构、制度,他保存和流传文化的数量还超过了任何一个人靠脑记口传所能担负的数量。这种为着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社区边界的浓缩作用和贮存作用,便是城市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之一。”[4](p. 105)

芒福德并不仅仅将城市看作是一个贮米槽或储物柜,而是将其看作是酿酒槽或发酵池。城市不仅承载物品和文化,更进行物品贸易和文化传播。正因城市的承载,使得不同文化、种族、语言、技术等积聚在一起,从而发生交流碰撞,融合聚合。城市便是促成这种聚合过程的巨大容器,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4](p. 37) 正因如此,芒福德尤为看重城市容器功能“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功能发挥的程度;因为城市的其他功能,不论有多重要,都只是预备性的,或附属性的。”[4](p. 105) 时至今日,芒福德所言的城市容器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摩天大楼、高层建筑等空间建筑技术让更多的人容纳进城市,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的发明让人们的沟通交流更为方便,摄影、录像以及大数据储存技术使得日常生活文化保存成为可能,航空、高速列车和高速公路等交通技术让更多的人发生面对面的交流碰撞。不过,因为城市容器能力终有限度,过多的人、文化和物质充斥其中,城市的“发酵”、“融合”功能逐渐开始下降乃至消化不良。正如芒福德所言“今天城市文化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增加城市这个容器的消化能力,同时又不让它变

成非常庞大的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大团块。”[4](p. 574)

(三) 城市的文化功能

城市的文化功能是芒福德最为看重的。在芒福德看来,城市首先具有保存、吸收、选择文化的能力。“城市有包涵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必要的浓缩凝聚和储存保管,也能促进消化和选择。”[4](p. 574) 芒福德城市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城市看作有生命的“有机体”。“传统机械论”将城市看作是冷冰冰的居住容器而非能够通过和周围环境建立积极联系而不断实现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有机体”。芒福德认为城市有生命、有温度且有生命力,而并非仅仅是一堆物理装置。“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4](p. 91)“归极”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两极分化,使其特质相对于原来状态有所偏离的现象,也称为“极化”。“归极”蕴含着分歧、差异、分化乃至两极变异。在芒福德那里,城市能够促使不同力量、不同因素、不同文化相互作用而产生聚合融合作用,但这种聚合与融合并不是以牺牲文化差异性、多样性为条件。相反,城市文化功能的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在文化融合的同时实现文化的分化和衍生,从而造就更为丰富、更有活力、更有力量新型文化。在此过程中,城市文化功能——即城市的文化转化和文化创造能力异常重要。正如芒福德所强调“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4](p. 582) 简言之,芒福德所言的城市文化功能指城市具有文化保存、吸收、选择、分化、转化和创造的作用和效果。

二、芒福德城市功能思想的教育意蕴

芒福德关于城市功能的教育意蕴在他第一部城市专著《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中已有所阐明。他在《城市文化》一书中论述的不仅仅是静态名词意义的“文化”,更有动态动词意义上培养、栽培之意。正如该书译者宋俊岭先生所言,虽然将“The Culture of Cities”译成“城市文化”并无问题,但它却只表达了作者原意的一半。

“因为,正如‘urbanization’一词有城镇化以及文明化的双关含义,这里‘culture’还有素养、栽培、培养、以及培养基等含义。……在该标题语境中,作者特别融入了大量‘培养基’这个含义。”[3](译者的话) 宋先生的判断是准确的。芒福德显然更看中城市“文以化之”的教育功能。随后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芒福德更是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述城市的教育功能。当然,这里所言的教育功能或教育蕴含是广义的教育,而非狭义的学校教育。

在城市的磁体、容器和文化功能中,最能体现教育蕴含的是城市的容器功能和文化功能。城市磁体功能的意义在于促使城市的聚集与形成。它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和意义相对较少。尽管如此,芒福德提醒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然是城市最为关键的功能之一,且对城市的精神向往较之物质向往来得更为久远且持久。

事实上,很难将城市的容器功能和文化功能区分开来。芒福德所言的“容器”并非承物之物,而是能够促使不同文化、不同力量、不同习俗相互作用的“发酵”之器。在此意义上,城市的容器功能是文化功能的前提,因为没有容纳,就没有碰撞和冲突,也就没有聚合和融合。简言之,在城市三大功能关系上,磁体功能是城市形成的前提,而容器功能又是文化功能实现的保证。

在广义上,芒福德所言的城市文化功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教育文化功能。它彰显的是一种积极生长的眼光。就像约翰·杜威将不成熟看作是一种可生长的空间和力量一样,芒福德将城市的巨大和拥挤看成一种积极的教育空间。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拥挤和庞大,城市才能将人们集合到一个合作和相互影响的共同领域。在此领域中,各族人民的文化,哪怕是少见且独特的文化能够得到呈现和交往。芒福德援引并赞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话说“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4](p. 122) 城市教育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两点:首先,城市中角色承担和社会交往有助于人性的完善。城市改造人、成就人的首要途径在于城市能够为人提供多种多样的角色,新角色“带来了法律规范、举止风度、道德标准、服装、建筑等各方面的变化”。[4](p. 122) 芒福德认为,单一职业或角色是对人格充分自由发展的一

种封锁。这一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分工是对人全面发展的禁限这一观点同出一辙。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策略是让教育与生产联系起来,让年轻人从一个部门流转到下一个部门,从而突破劳动分工对人性发展的桎梏。在芒福德眼中,尽管城市劳动分工依然存在,但城市的社会结构及其形式的整体性却有助于修复劳动分工的限制。“城市的社会结构有助于它克服自身对于人类的限制性和强制性。如果说城市肢解了人的整体性并强迫他在单一的工作中渡过一生,那么城市则又从一个新的集团的实体上重新把人复原了;从而使得在单个的人生显得狭窄枯燥的同时,由此编织而成的城市整体却显得丰富多采,因为编成它用了各色各样的线。”[4](p. 116)

城市中人的个性化除与角色承担的丰富性相关,还与城市生活社会交往的丰富性有关。角色对于人性的完善也得益于社会交往。城市在贸易或战争的过程中极大地增加了不同城市人相互交往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心理冲击和刺激机会。而“经常性的社会交往,以及文化艺术生活的陶冶,使人的情感得以锻炼、提高和训练”。[4](p. 122)

其次,城市为人们提供了进行有意义对话的最广泛场所。芒福德认为,“城市是一个专门用来进行有意义的谈话的最广泛的场所”。[4](p. 123) 在城市中,像竞技场、法庭、审判、议会、运动场、市政会议、辩论会等都在为城市人提供对话的场所和机会。芒福德高度赞扬了“对话”的价值和意义“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长长的青藤上的一朵鲜花。”[4](p. 123) 在他看来,城市结构及其空间为对话提供了场所和机会,通过对话,城市人群能够扩大社交圈子,从而让更多的人参与对话。“随着城市中职业和人物的不断分化,城市就不再是一个具有相同思想方法的统一社区,不再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控制。”[4](p. 123) 城市包容了不同的人物、不一样的阶层以及不一样的文化,这是对话的前提条件。随着对话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最终城市中的对话会演变成城市戏剧。芒福德用城市戏剧(city drama)来表达城市生活特有的性质和状态。在英文中,戏剧(drama)拥有丰富的内涵意义。它既可以表示舞台戏剧,也可以表示事件、冲突等。从广义上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可以看作是戏剧的

衍生。戏剧中最为关键的是角色扮演和责任承担。有研究者认为戏剧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义,并从教育的角度解读日常生活中的表演。[5]显然,芒福德对此观点也是赞同的。尽管城市生活中的日常内容、家务劳动、生产活动、服务事业等也可以在其它地点进行,但芒福德认为,“只有在城市中它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和竞争性去活化戏剧情节,把表演者们推向精彩、专注、自觉参与的最高潮”。[4](p. 123)

角色扮演与承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扩大、城市使对话成为可能这些都使得城市教育功能得以可能。“终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以超越其神灵的禁限。”[4](p. 117) 简言之,芒福德城市功能思想的教育蕴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具有教育的使命,城市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改造和人性完满完善;二是认为城市有教育的功效及其可能。这一对城市本质及其功能的教育解读大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城市使命和本质的认识,也将为当前中国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三、对当代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启示

(一) 实现城市发展的“教育转向”

在教育层面,芒福德城市功能理论对于当前中国城市化建设最为重要的启示即是要实现城市发展的“教育转向”,包含“目的使命转向”、“发展思路转向”和“评价尺度转向”。

首先,重新确立城市的“教育使命”。“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是为了居住。他们之所以聚居在城市里是为了美好的生活。”[3](p. 517) 芒福德提醒我们,城市最为关键和本质的使命是改造人、成就人。美好的生活不仅意味着更丰富的物质享受,也意味着更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以及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城市不仅是物质容器,更是一个安放价值、意义和精神的地方,正是精神的吸引才促成城市的形成。确立城市“教育使命”即是要让城市人类在城市寻找“意义”、“自我”和“人性的完善”。就像芒福德所讲“未来城市的使命……是把人类的最高利益放在他全部活动的中心地位:把支离破碎的人性人格重新统一起来,把人

为地肢解了的人——官僚、专家、‘能手’、失去人性的特工密探等——变成完全的人。”[4](pp. 583~584)

其次,探索“城市教育化”的发展思路。当前城市化建设,更多秉持的是经济发展思路。“工业之都”、“商业之城”、“金融之城”、“煤矿之都”、“机械之都”等成为各个城市争相角逐奔跑的目标。在此意义上,城市化意味着“城市经济化”。“城市经济化”将城市看作是经济的孵化器,认为城市的最大功能在于经济。“城市 GDP 主义”即是“城市经济化”最为重要的表现,一个城市发展的水平用经济数据来权衡和评价。为了提升城市的经济数据,城市及其郊区的环境、资源、人力等被过度消耗,城市发展无以为继。为此,芒福德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使城市恢复母亲般的养育生命的功能,独立自主的活动,共生共栖的联合,这些很久以来都被遗忘或被抑止了。因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4](p. 586)这一呼喊向我们提出了城市化的另一种思路:从“城市经济化”走向“城市教育化”。所谓“城市教育化”指的是注重发挥城市的教育文化功能,将城市化成一个教育的机构,最大限度发挥城市中一切人和资源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用教育的眼光和尺度来衡量城市发展。“城市教育化”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城市的经济功能,而是主张用教育的眼光和尺度来重新审视城市发展的思路以及城市化最终的目的和方向。正如芒福德所言,城市的教育转向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经济模式。在此意义上,城市化最为核心、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城市建设问题,而是人的教育问题和人性完善问题。

最后,确立城市发展的“教育尺度”。不论是确立城市的“教育使命”还是指向“城市教育化”,最终都需要落实到评价实践,确立城市发展的“教育尺度”。

教育尺度首先依赖于“教育眼光”。教育眼光主张从更有利于人性完善、人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城市的一切。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例,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思路是将高科技产品运用到城市管理,尤其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从而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智慧水平。如若从“教育眼光”或“教育视角”出发,“智慧城市”的蕴含将重新界定“智慧城市”不应

当仅停留在“利用智慧技术、分享智慧产品”层次,而应当上升到“分享智慧、培育智慧、创造智慧、提升智慧”的高度。换言之,“智慧城市”应当在资金、制度、文化等多方面为“智慧培育”提供环境和平台。相关举措可能包括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及其交易制度,鼓励技术创新及其应用,建立高创造性人才交流、沟通制度,形成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等。

比“教育眼光”更为关键的是“教育尺度”。对此,芒福德早有判定:城市的“目的在于能自知自觉,自治自制,自我实现。他们活动的中心将不是工业,而是教育;每一种作用和功能将按照它促进人类发展的程度来加以评价和批准”。[4](p. 584)确立城市发展的“教育尺度”其本意在于确立城市发展的“人的尺度”和“人性发展尺度”。城市发展的“教育尺度”可以从“城市教育资源指数”、“城市教育功能指数”、“城市教育文化指数”、“城市教育成就指数”等方面具体细化。其中“城市教育资源指数”指有形可见的教育资源。如城市的教育文化投入、公共教育文化机构数量(含正规教育的学校数量、教师数量等);城市教育功能指数主要衡量城市机构的教育职能发挥。如家庭、社区、工厂以及其它公共机构与教育联系的紧密程度,城市机构的教育使用率、开放程度,利用频度和利用质量等;城市教育文化指数主要是城市人教育文化氛围与意识,城市管理者的教育文化管理开发制度和意愿等;城市教育成就指数则主要指城市人的教育文化水平、素养、意识和能力。

(二) 发掘城市建设的“教育资源”

城市化建设要实现“教育转向”,还必须聚焦“教育资源”的开发与拓展。城市“教育资源”的发掘既需要继承乡村,也需要内部挖潜。

“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乡村化”的过程。在通往城市的过程中,一个个“乡村”消逝不见。据《中国统计摘要 2010》的统计数据显示,从 2005 年到 2009 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数目逐年减少,平均每天有 20 个行政村消失。[6]在此意义上,城市化倡导者和实践者需要考虑,从“乡村”走向“城市”,我们得到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事实上,“去乡村化”的过程中,消逝的不仅是房屋和田,更是乡村的文化形态、邻里的亲密关系和农村人的淳朴气质,而后者恰恰是最为重

要的“教育资源”之一。因此,要实现城市的“教育使命”,首先是要保存、继承乡村的“教育形式”、“教育空间”和“教育资源”,其次才是发掘城市的“教育资源”。

在乡村,小孩的教育不仅仅是父母或学校教师的责任,更是村落中所有人的责任和义务。当一个小孩在田里拿别人家的东西或做了一件“坏事”时,所有村民都可以作为尊长来教育他。城市里的状况则变得迥异。即便是住对门,很多住户也不一定认识对方,即便认识也不过是“点头之交”或“照面之谊”。关上房门,外面的世界变得与自己无关。城市中的人处于一种孤立化、原子化状态。孩童的教育纯粹变成父母或者学校教师的责任。诚然,乡村文化有其封闭性和狭隘性,存在“极度俭省的自给自足方式和睡意朦胧的自我陶醉”,它“过于稳定,它墨守陈规旧俗,不愿采纳新的生活方式”^[4](p. 103),但就教育责任的承担和每个人的教育职能发挥而言,它优于城市。这是城市在去乡村化过程中需要予以考虑和留存的。

乡村之于教育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其独特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关系,也在于其独特空间乃至建筑空间。空间从来就不是一个物理或地理概念,它也蕴含着社会价值和教育意义。乡村的房舍多是毗邻而居,它没有厚重的防盗门和密码锁,人与人之间可以更为自由地串门、交谈和对话。城市高楼虽很好地保护了住户的隐私,却也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发挥空间的教育意义上,城市住房显然不如乡村房屋。在城市内部,高层的具有独立卫浴的商品楼不如传统的集体“筒子楼”,更不比“四合院”。从四合院到高档的景观房在经济上可能是一种胜利,但在教育上却是一种退步。在通往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需要继承乡村的教育基因和教育结构,并寻求城市教育空间的开拓与发展。

城市“教育资源”的发掘更为复杂,也更为紧迫。首先要开发更多的正式教育资源,其次要开发更多的非正式教育资源,尤其是现有城市设施教育职能的开发。“建学校”是一种最为直观可行的方案。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

多的育龄儿童将进入城市,学校开始成为稀缺资源。以上海为例,据调查统计预测,到2015年,上海学前和义务教育将缺口两万个班级。^[7]显然,开办更多的学校是保证城市“教育资源”的前提。

不过“建学校”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只有孩子和年轻人才在学校里学习,更多的成年人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更多的学习在学校之外,如工厂、商场、体育场、咖啡馆、博物馆、图书馆和广场等。因此,城市需要积极开发上述空间的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芒福德关于“容器”的认识启示我们,不能仅仅将上述机构看成是存放人口和物品的地方,而应将其改造成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发酵之地”。“开放”和“交往”应当成为发掘上述机构教育功能的两大原则。“开放”是前提,城市中的机构应当对所有人敞开。“交往”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机构的开放和交往也仅仅是其中的一步,职业、阶层、制度等的开放和交流是更深层次的教育资源挖掘。所有一切的开放和交往都旨在促进与他人、自然、社会和自我进行对话,既丰富城市的总体经验,又增添自我的教育经验。

参考文献:

- [1] 城镇化规划纲要将出 未来十年或拉动40万亿投资 [EB/OL]. <http://finance.qq.com/a/20130328/002649.htm>.
- [2] 金经元. 芒福德和他的学术思想 [J]. 国外城市规划, 1995, (1).
- [3] [美]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M]. 宋俊岭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 [4] [美]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5] 李政涛. 表演: 解读教育活动的视角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 [6] 城镇化需警惕“农村消失危机”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11/10/c_122259957.htm.
- [7] 徐瑞哲. 上海学前与义务教育缺口大 据预测两年后尚缺约两万个班级 [EB/OL]. http://xmwb.xinmin.cn/home/html/2013-06/12/content_5_4.htm.

(责任编辑: 子聿)